

流动性赋权:女性农民工的主体建构研究

孔海娥

(江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56)



摘要 流动作为一种赋权,使得流向城市的农村女性成功“脱域”和“脱序”。女性农民工的流动过程是一个资源累积与能动性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赋权过程,通过多维资本的累积与能动性的发挥,女性实现了经济、社会与自我层面的全面赋权,完成了个体身份的转型与主体性的重构,建构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主意识的、能够自由选择 and 实现自我价值的主体形象。女性从被建构的“女人”“打工妹”和“乡下人”转变为“独立女性”“老板”和“城里人”,突破了父权制、二元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束缚与桎梏的同时,实现了对自我的建构。研究发现,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复杂性的特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经历了被动适应到主动反抗,再到无意识合谋的过程,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是女性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 流动性赋权;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2-0184-10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5.02.016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社会秩序的保证、社会活力的张扬是“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下社会治理工作的结果呈现。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在关注个体需求、促进社会包容性、增强社会参与^[1]、改善社会福祉、激发社会创新方面发挥作用,为社会秩序的保证、社会活力的张扬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大范围、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一直持续了四十余年。年轻的女性是这场流动的重要主体,她们在结束学业后便投入到外出务工的大潮中,将成长的关键时期交付给流动的城市生活,实践着流动的人生之旅。外出务工对于年轻女性而言意义重大,流动将其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创造经济收入的同时,更为她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以往的乡村社会,她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生命的‘客体’而存在,主要依循于男权秩序而生活,被塑造、被决定是一种常态,到城市语境中各种形塑和替代的男权力量开始式微,城市的各种阻滞性力量又迫使其开始反观和建构一个真实的自我”^[2],在获得更大的权力空间后,女性“能获得控制外在的人力、资金 and 知识等资源的能力,由此带来内在能力的增长、自信以及观念的转变”^[3]。

在社会流动和破除男权的背景下,认识和把握农村女性主体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必须立足于自己真实的经验,在尊重每一个人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生命史的研究方法符合这一要求,该方法关注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轨迹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将个体的生命历程视为更大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产物,为理解个体生命历程的多维度和动态性提供了有利的视角^[4]。本文关注的是一位外出务工的女性在务工及创业中通过反复赋权建构其主体性的生命史,试图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揭示女性主体建构复杂而多维的进程,为理解女性农民工乃至更广泛女性群体的主体性提供新思考。

本文案例源自笔者对一位名叫阿燕的外出务工女性长期的、持续的 and 深入的观察。访谈主要有5个时间点,即2007年1—2月初次见面、同年7—8月她在乡间待产期间、2011年11月她在FYD工

作、2019年10月以及2023年4月。日常我们还通过QQ、微信等社交软件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工作,以此观察阿燕身上所展现的强大的个体能动性。通过观察使我相信“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建构自身生命历程。”^[5]这是一个“把自我和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创作,去发明和创造自我”的过程,“是作为主体的自我生长、展开、最后完成主体自我、实践主体‘存在’的过程”^[6]。

一、文献综述

关于“主体性”最早源于哲学家的思考,关注的是自我以及自我的形成^[7]。女性农民工主体性的研究主要有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性的研究、“主体—实践”范式下的女性农民工主体性研究及“流动”赋权视角下的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三个视角。

第一,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性的研究。西蒙·波伏娃认为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是次要的,是“他者”,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女性要成为拥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体^[8],凯特·米利特强调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因此必须通过社会结构的变革来实现女性主体性的建构^[9],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女性的主体性受到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需要通过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来解放妇女。Crenshaw提出“交叉性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性受到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身份的交叉影响^[10]。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是一种表演,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强调主体的多样性与流动性^[11]。20世纪80年代,福柯关于主体被知识结构与权力机制建构的思想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关注,认为规训权力技术、知识—权力机制以及性机制是建构女性主体的深层机制^[12]。Susan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有被建构的主体与具有建构能力的主体两个方面^[13]。西方女性主义探讨了女性主体建构的结构性困境和多元路径,并希望建构一个独立的、具有自主意识的、能够自由选择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主体形象。

第二,“主体—实践”范式下的女性农民工主体性研究。社会科学家强调将主体性问题放在实际经验中加以检验,以实践为支撑,构成我们对于自身处遇的重要感受、经验和续写个人历史的能力^[14],主体—实践范式关注行动者主体及其日常生活实践来研究行动者以及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行动策略、行动目标及行动后果,强调个体并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15],对农民工的研究出现“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学研究转向”^[16]。最早从实践角度对女性农民工主体性的研究遵循的是结构主义的视角,认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性农民工面临着阶级、性别及城市制度的多重压制,而后的一些研究强调女性并非只是被动的“受压迫者”,打工妹以“尖叫”的消极抗争表明主体性的存在^[17];打工妹既是“经验的创造者”,也是“反抗的能动者”,性别、种族、族群、民族性等成为工人多元主体性的维度^[18]。随后对女性主体性的研究从生产领域跨越到更为广阔的主体社会建构过程,“话语策略”强调打工妹采用个人微观策略和城市发生接触和互动,以获得生存和发展^[19]，“身体策略”认为打工妹通过对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改造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和适应城市生活^[20]，“消费策略”认为尽管女性在生产领域被建构为廉价、卑微、次等的“生产主体”,但在消费领域渴望再造为更自由、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主体”,女性可以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的主体存在,而形塑这种主体的是消费主义和男权制度的合谋^[21],劳动对女性的主体建构意义重大,它是一套实施影响的自我转换机制,是具有多重意义的转换平台^[22]。另有研究发现那些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女性农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并能在主体意识的激发下,自主、能动地做出行为选择,意识觉醒与人力资本得到提升^[4]。有学者从“认知”和“资源”两个层面将“90后”打工女性的主体性分为消极性主体、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7]。

第三,“流动”赋权视角下的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早期学者们强调流动经历是获得城市现代性的过程^[23],在接受了工厂的现代化培训和工作之后,城市生活的“惯习”使得个体逐渐成为现代化的个体^[24],流动使农民工实现了“‘充权’而逐渐变得‘强大’,从而能够自我形塑、自我成长、自我掌控、自我超越、自我提升”^[25]。在对女性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均强调流动对主体性建构的积极影响,它是摆脱传统生活而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途径^[26],流动可以“作为改变自己命运”“作为自我发

展”以及“作为间歇”^[27]而改变女性的生命进程,流动为农村女性成功实现空间上的“脱域”和传统秩序中的“脱序”创造了条件^[28-29],流动是农村女性打破传统家庭父权制和城乡二元体系束缚、实现自身增权的社会过程^[30]。

以上研究展现了女性主体性形成的多重困境和多元路径。尽管在构建主体性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结构性因素的交叉影响,但女性农民工依然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采取各种策略,以适应城市生活并完成主体性的建构。

二、城市生存实践:流转的工作与流变的自我

埃尔德指出:“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塑造着”^[5]。个体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创造者。从2003年阿燕只身一人前往深圳成为南方都市千千万万的“打工妹”之一,到2013年她利用前期累积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深圳开了第一家服装店,成为繁华都市里的“小老板”,及至2023年,阿燕已在广东购置两套房产,并因此落户而成为真正的“城里人”,阿燕在一份份流转的工作中实现了自我的华丽“蜕变”。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实践运作的空间,而阿燕正是在城市的工作场域中完成了主体的建构。

1. 小镇专卖店店长:自主适应职场生活的个体

阿燕出生于1986年,在她两岁时父母离异,她与被称为“半仙”有些神智不清的母亲一起生活。问及父母离异对阿燕的影响,她直言道:“其实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影响,我爸妈这种错误的婚姻,对我的人生来说,让我经常去面对,学会独立。”破碎的原生家庭,让阿燕更为“独立”,也更少受到乡村传统文化及家庭对其身为女人的诸多“规定”与“限制”。初中毕业后,阿燕在一所中专学习服装专业,中专毕业后,漂亮自信的阿燕在镇上的一家专卖店工作。“那是我们镇上的第一所专卖店,很正规,不能随便讨价还价,只能打折。”在这样“现代”与“先进”的场所工作,阿燕的骄傲溢于言表。最初促使阿燕离开家乡只是缘于一张照片。“我店里有个女孩子他哥哥在深圳上班,给我们看了一张世界之窗的照片,真的很漂亮,还有欢乐谷,非常地吸引我,我受不住诱惑就想出去。”与深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便使阿燕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她下定决心要在结婚之前出去“闯一闯”。改革开放的很多年,城市文化对于乡村文化而言形成了一种“霸权”,城市文化因其丰富多彩的形态冲击着落后、封闭、保守的乡土文化。在农民工脱离‘生于斯养于斯’的乡村来到城市的行为逻辑中,体现了一种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自觉生成,而这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之一,是农民工获得发展的一场重要的社会运动^[31]。阿燕也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2. 深圳商场收银员:被动接受现代企业制度“规训”的个体

21世纪的中国农村,外出打工倍受推崇,除了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是他们走向成熟的一种“通过仪式”。2003年,阿燕拒绝了老板的强烈挽留,只身前往深圳。但都市生活并非如阿燕所想象的那般美好,工作是使乡村女性立足城市的根本,而工作对初来乍到的阿燕来说又异常残忍。“那时候我刚出来,就想早点找份工作稳定下来,只要能先混口饭吃就可以了。”尽管已有所预期,但第一份工作仍给阿燕当头棒喝。“那真是魔鬼般的训练,因为不是一个很正规的商场,早上六点半起来,到十二点去吃饭回去睡觉,然后到晚上六点钟再去上班……那真是魔鬼般的训练,我第一天都快受不了。”进入城市生活的乡村女,必须以一种超常的速度来适应城市生活,这种训练使她们变成具有现代性的主体—自觉接受纪律支配的工人,或楚楚动人的白领小姐,或最理想的现代主体^[32]。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监控和规训,打工妹们被训练得“驯服而有用”,凭此她们才可以获得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工资。由于这份工作与阿燕“做服装”的梦想距离遥远,有着清晰规划的她毅然地换了一份卖衣服的工作,但“讨价还价”的销售模式让她心生厌恶随后离职。第二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外出前对城市生活及未来有了一定的规划和憧憬,其流动不再盲目,大多态度积极、目标明确,想要脱离农村、背离农民身份的意图更为强烈,因而当现实与其目标

不一致时,会很快地推倒重来,少有犹豫。这一时期的阿燕是城市生活中典型的“他者”,是“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失去话语权,产生自卑感,形成某种不平等或压迫关系”^[33]的“他者”,为了生存,她们努力学习新技能,被动地接受改造以适应现代企业和城市生活。

3. 大型商场的销售员:积极接受现代企业制度“培训”的个体

辞掉工作的阿燕辗转到了一家大型商场卖衣服,尽管同样是卖衣服,但这次,她却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阿燕数次用同样一句话谈及这次转变:“我觉得进天虹完全改变了我,甚至改变了我的一生。”阿燕在天虹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资源,她的潜能在这里得到了更大发挥。“天虹”是深圳的一家大型购物商场,这种大型商场与其之前工作过的专卖店及地摊式的销售完全不同,她数次强调她销售的是“国际品牌”奥菲曼,目标客户是职业女性、白领,有学者对酒店服务人员的研究发现,工人建构自我认同时有“借声望”的倾向^[34],销售着“国际品牌”的阿燕,面对着“白领”的客户,自身也产生出一种“高级感”。新公司不仅仅关注销售额,也非常关注员工个人的发展。“我觉得在天虹上班,好像实现了自我价值一样。我理解了服装的概念,那些服装设计师可以给我很多灵感,……每次回公司,都要做笔记,讲服装,讲造型,化妆,比如说今年流行什么妆,还有什么鞋,从国外回来的设计师对我们进行培训,比如洗涤方法,流行趋势,他会教我们很多东西。”职业培训在新生员工的身份塑造中常常扮演着强制性的规训角色,这一知识储备过程也提升了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是推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能动性的重要因素。与做收银时完全被动地接受现代管理制度的规训不同,这一次的工作激发了阿燕对知识和学习的全部渴望与热情,她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关于“服装新概念、设计、造型、化妆、流行趋势、洗涤方式”的全面知识,并运用这些新知识、新理念对自己进行着从外在“身体”到内在“观念”的改造,在知识的汲取中她不知不觉地拓展着自己的发展空间,觉察着自我的成长和蜕变。“奥菲曼会组织很多活动,介绍服装知识,让你有市场观,更有品味。我感觉自己是一边在学习,一边在工作,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我的视野变得开阔一点。”

阿燕特别提到了与一位白领客户的交往过程,她在其间不仅获得了来自这位“白领”的肯定,正是通过这位“重要他者”的眼睛,阿燕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有一位顾客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后来衣服有些掉色,她过来找我……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坐着说,为了体现我的诚意,我给她办了一张VIP卡……第二次她又过来……她大概在我手上做了十几次生意,光买衣服就买了大概两万块钱的。后来她带过来的朋友也特别信任我……所以有时候别人这样对你说的时侯,你自己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就感觉好像非常成功样的。这样的事就越做越有兴趣。”

阿燕详细地叙述了与这位顾客的相识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她向我展演与建构的正是经过职业培训后达成的“专业”的导购形象。阿燕为这位“显著的他者”贴了各种标签,“有身份的白领顾客”“城里人”,“日本留学回来的”,正是来自这位多重“身份”的“重要他人”的积极反馈使阿燕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知。拉康认为,主体实现对“自我”的感知必须要经过一个重要的时间段——镜像期,即通过他者的目光我看到我自己^[35],阿燕在这位重要“他人的目光”下建构起自己的新形象,其主体性也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以确认^[36]。出色的销售能力、扎实的服装知识以及周到的专业服务使阿燕迅速脱颖而出,再加之身材高挑,长得漂亮,2006年底在公司的年会上她被邀请做“兼职模特”而走上秀台,成功实现了“跨界”表演。这是阿燕发生蜕变的关键期,现代企业的培训、与重要他人的互动、T台首秀等都一步步拓展着她的发展空间,再加之持续增长的知识和收入都在不断地激发她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去探寻自我可达的边界。

4. 机场奢侈品店的导购:积极主动进行“内外”改造的个体

2007年5月,阿燕怀孕了,她不得不告别喜爱的工作,回到爱人的家乡,开始了在这个完全陌生地方的待产生活,随后与朋友在家乡开服装店失败。2010年,阿燕再次前往深圳,开始了另一次逐梦之旅,她将仅剩的两千元钱花掉一千二百块买了一张机票。多年以后,阿燕还在感谢自己的这次奢侈消费,让她的人生再次出现转机。在机场经过购物区的时候,阿燕没有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她有了另外的思考。“机场工作环境很好,工资应该也非常高。我觉得我应该属于这个里面,我应该在

这种针对高端人群的环境里去做事。……虽然没有接触过手表行业,但是我很有自信……只要我肯学就没有问题。”

正是这次几乎花掉所有积蓄的“冒险”旅程让阿燕第一次见识了机场工作环境的“高端”与“优越”,从此她心生向往,“我每天都望向机场的方向,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去机场工作”。漂亮的外表、得体的衣着、良好的表达能力以及浑身散发的自信使阿燕顺利地得到了这份工作。当然,从“服装业”到“钟表业”的转变也给阿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头三天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打退堂鼓,因为没有实习,我拆表带也不会拆……有个同事慢慢教我……后来第二、三、四个月,我都是卖了公司第一,公司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与大型商场里的导购相比,在机场奢侈品店工作的阿燕更是从“内”“外”两方面积极主动改造自己。除了在单位接受全面系统的知识培训,阿燕也利用业余时间充电,她买来MP3自学英语,利用下班时间去夜校读服装设计的大专,她更加注重外在形象,学习化妆和提升品味。“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跟以前还是很不同,毕竟是一个奢侈品行业……我不仅仅是一名导购,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也是一个品味提升的过程……在工作方面对我们提升很多,我得到了更多,其实并不是我付出得多。”

吉登斯认为,个体可以依据其个人经历形成对自我的反思性理解,阿燕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反思”能力的行动者。“其实在天虹的时候工资没多少,还累得要命,每逢工作日从早上到晚上的加班,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这边就不一样,我们每天上七个小时的班,从来就不用加班……那待遇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工作的环境当然更没得说,我们见到的都是商务人士,比较有身份,打工的非常少,这种高端商品他们基本上是不会买的。”“固定的工作时间、没有加班、良好的环境、高端的商品、品味”是这一段经历中她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消费可以用来“包装”自身,是完成身份建构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程序,但通过为“消费奢侈品的成功人士”提供服务,借助于客户的“高端性”同样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在深圳务工的第七个年头,阿燕已经不自觉地将在奢侈品店工作的自己与其他“打工者”区隔开来。不菲的收入、得体的衣着、精致的妆容,丰富的奢侈品知识,阿燕从外在形象、内在知识以及修养品味上不断改造自己以与“奢侈品”导购这一身份相契合。“现在我经常买香奈儿香水,……慢慢的提高自己的品味,低档的我也不会去看。”戴维·斯沃茨认为,个体可以通过特殊的文化品味、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等,实现新职业、阶层和群体的划分^[37]。

新工作提供的旅游休闲机会也让阿燕产生全新的体验,她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份工作已经不再仅仅要求你会“销售”,也要学会“休闲”,这是普通打工者无法想象的“福利”。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有闲阶级可以通过炫耀式消费和休闲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38]。“每年有一次旅游的机会,比如去年云南,今年泰国,这是一般打工者无法想象的福利。在这里做事觉得人很舒服,他不仅考虑你的销售,还会考虑你的娱乐休息……”2011年,当她还在FYD工作时,她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规划:“其实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规划。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永远都不要安于现状的……虽然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我从来就没有轻视过自己,我所从事的工作累积就是我一生的财富……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料,我不怕输。”

女性的主体性,是女性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一种肯定,是体现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自觉能动性,是能够把自己视为主、把外物视为客的力量呈现^[39]。阿燕的这段话,极好地呈现了作为完整主体的她对于自身力量与能力的一种肯定,她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并有着很强烈地执行力去实现目标,而在人力、文化以及经济资本的累积中她对自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能够树立目标勇往直前。

5. 深圳服装店“老板”:充分发挥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

在女性主义看来,要摆脱“他者”和“他性”的状态,女性就要像超越性主体一样以创造性的设计构造自己的未来,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解放或达到完善^[40]。在十余年努力地累积各种资本后,阿燕终于开始创造性地构造自己的未来。阿燕安心在FYD工作了3年,在那里她获得了几乎所有的荣誉,华南区销售冠军、员工形象代言人,在公司要将她升级为区域经理时,她放弃了。她坦言只想通

过这个岗位去磨练自己,她一直在为她的梦想准备着。“我去夜校读了服装设计,每天来回坐地铁四个小时,上班八个小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之后考了个大专文凭。”教育是女性积累文化资本打破阶层壁垒实现地位流动的重要方式,阿燕为此时刻做着准备。

经过二十年的职场磨炼,阿燕贪婪允吸着各类知识累积着各种经验,如今,她已拥有6家服装店和两套房产。在朋友圈里可见的是她的小店开张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尚炫目的穿搭,以及下班后带着员工们享受着繁华都市的夜生活。而对于已经拥有6家分店、50余名员工的阿燕来说,管理也并不是一件难事。“管理这个东西真实来说的话,我也很感谢FYD,因为他们经常有各种培训课,包括我现在的排班表、销售报表、财务报表这些都是在那里学到的,然后自己慢慢摸索。”2014年,阿燕在第一家店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2015年,她利用开店两年的收入,在惠州买了个小别墅,可以说是打工妹在城市通过创业实现梦想的赢家。对于成功,阿燕也进行了总结,那就是有要“清晰明确的目标,不要太迷茫”,“对于自己的梦想,愿意花心思去努力实现”。在笔者最后一次见到阿燕的时候,她已完全由十几年前那个“乡下姑娘”成为了“时尚精致”的都市女性。自主创业时期的阿燕,是将其前期累积的各类资本投身创业实践的时期,她利用流动实现了经济、社会以及自我赋权,冲破了结构性对她身为一个“乡下女”的重重桎梏,建构了一个独立的、拥有自主意识的、能够自由选择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主体形象。

在对阿燕工作创业生命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正是在不同工作场域中发展空间的拓展以及累积的各类资源,促使她实现了主体的建构和身份的转型。“乡下人”“打工妹”如同悬在阿燕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她用十余年的时间利用不断累积的人力、文化以及经济资本拓展着发展空间为自己赋权,跨越了身为“打工妹”的阶层桎梏,打破了作为“乡下人”的二元社会结构对其的束缚,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城里的”“女性”“老板”。对阿燕20年的打工创业史的研究,“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描绘出一种‘自我形象’,而是基于自我建构出一种超越自我的‘集体表象’”^[6]。在阿燕的身上,看到的是千千万万如阿燕一样的“乡下女”如何通过工作建立起与城市的连接,如何不断拓展发展的空间和累积资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一幅中国经济的腾飞史与打工人的奋斗史跃然纸上。

三、流动中的赋权机制:资本累积与能动性的交互促进

Kabeer的“资源—能动性—成果”理论指出,女性通过将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外在资源内化为自身增权的动力^[41],阐述了其如何通过外在资源的内化来增强自身权力并实现积极的成果。本文将基于阿燕的流动经历来探讨其如何通过人力、文化与经济资本的累积以及自身能动性的作用,实现经济、社会与自我赋权,最终完成个体身份的转型与主体身份的重塑。

1. 资源累积维度:多维资本的构建

资源累积是赋权历程的起点,女性从乡村去往城市,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一个在流动中逐步累积多维资源与建构多元资本的过程。在人力资本方面,城市作为知识与技能的汇聚地,为女性提供了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等多元化的学习机会,显著提升了其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正是得益于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阿燕凭借个人的能动性,将它们有效转化为自身的专业技能与管理能力,这些能力构成了她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为其后续发展与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化资本方面,城市的多元文化激发了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促进了其文化素养与专业能力的提升,重塑的形象也使其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挑战传统性别角色,使阿燕可以自主地做出创业的决定,实现从“打工妹”到“老板”的跨越。经济资本方面,城市就业带来的稳定收入不仅提升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更为其后续的自我投资奠定了物质基础,无论是读夜校、创业还是购房都是基于阿燕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基础之上做出的决策。

2. 能动性维度:资源内化为自我增权的动力

能动性作为资源转化为赋权成效的催化剂,深刻影响着女性农民工的自我增权。在此过程中,女性自身的能动性不仅推动着其对人力、文化和经济资本的持续追求,还通过资源的内化进一步强

化了她们的能动性,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就经济能动性而言,阿燕通过积极投身于工作中不断累积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这一过程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她的能动性,促使她的工作中展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社会能动性则主要体现在职业生涯及日常生活中不断拓展其社交范围,对于阿燕而言,同事乃至顾客都成为了她新的社交资源,加之个人形象的重塑,极大地提升了她的自信心与创造力,也进一步促进了其能动性的发挥。

3. 成果维度:经济、社会与自我赋权的实现

成果是资源累积与能动性发挥的最终体现。正是通过在流动过程中人力、文化与经济资本的累积与能动性的发挥,女性农民工实现了经济、社会与自我赋权。经济赋权体现在女性农民工通过提升经济收入增强了话语权和决策权,比如阿燕的创业和购房是在累积了一定的经济与人力资本后自己做出的决策。社会赋权主要体现在通过构建社交网络、积累文化资本等方式挑战了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在工作中阿燕是专业的导购员,在创业时期她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女老板”,不断拓展自己的影响力。自我赋权则体现在,阿燕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接触各类新观念、新思想,一步步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认知的改变,并在能动性的推动下最终促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女性农民工的流动过程是一个资源累积与能动性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赋权过程。女性在初入城市时面临着父权制、二元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等多重束缚,也正是利用流动的机会,借助于资源的累积和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她们不断挑战和突破这些既有的结构,在实践中挑战并重塑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与城乡身份,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微妙变化。

四、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与路径

在对阿燕20年城市务工创业生命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女性在流动中实现了赋权,也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性,这一过程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反抗,再到无意识合谋的复杂而深刻的全过程,而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是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

1. 女性主体建构的过程:被动适应—主动反抗—无意识合谋

面对工作节奏加快、文化差异显著的城市生活,女性在流动之初通常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通过调整作息、学习新技能、遵守职场规则等方式累积各类资本,为主体性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做着种种准备。随着城市生活的深入,农村女性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她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现状,而是试图通过教育提升、品味塑造、职业进阶等多维努力,反抗社会给她们贴上的“打工妹”“乡下人”等标签,在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下试图打破社会对其固有的认知与刻板印象,在主动寻求改变中实现从“他者”到“自我”的蜕变。当农村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成功跨越社会阶层、实现身份跃迁后,她们面临着新的社会定位与角色选择。一方面,女性渴望彻底摆脱旧有标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在摆脱阶层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与父权制的压迫中,她们又无意识地与现有的结构性压迫“合谋”,将其它的“打工人”视为“他者”,与已实现阶层跨越的自己“区隔”开来,从而再生产了这种社会结构。

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动态性、过程性、复杂性的多维进程,而非遵循从被动顺应到主动抗争,最终陷入无意识共谋的简单线性轨迹。这一过程深嵌于社会变迁的洪流、文化冲突的激荡以及个人成长的轨迹之中,展现出女性如何在社会结构的框架内探寻自我认同,同时又在权力与压迫的夹缝中奋力争取自主与解放的生动图景。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之间形成的那种既微妙又复杂的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女性主体身份的构建,本质上是对现有社会结构的一次次质疑与重塑,也是女性不断发掘并实现自我潜能的过程。

2. 女性主体建构的路径:经济独立—教育提升—自我觉醒

农村女性流动到城市后,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是其实现女性主体建构的核心维度,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女性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独立是基石,为女性提供了摆脱传统束缚、自主决策的物质基础。工作是女性从农村流动

到城市完成其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场域,城市多样的就业机会使女性能够平等的进入就业市场,使之实现了从维持生计到经济自足乃至财富积累的跨越,更为其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其追求继续教育、职业规划等高层次发展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并激发了其潜能的发挥。

教育提升是女性主体性深化的关键驱动力。女性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各类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中,不仅累积了知识拓展了思维,更是一场自我认知的深刻变革。教育赋予了女性批判性思考与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她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明确个人发展需求,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了价值观念、人生目标乃至世界观,而这为主体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自我意识觉醒是经济独立与教育提升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女性在经济独立带来的自由空间与教育提升激发的深层思考下,开始主动探索自我、审视自我,明确个人需求与愿望,采取积极行动追求自我实现。这一过程不仅是女性主体性地位确立的鲜明标志,更象征着女性从传统的被动适应向积极创造、自我主导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女性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与释放。

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完整框架,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女性个体成长的内在逻辑,也反映了社会变迁对女性地位与角色的深远影响。当然,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除上述三者外,还涉及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但基于本研究的个案,暂未对其他方面展开论述。

五、结论与反思

女性的主体性是一个被建构、建构又合谋再建构的复杂过程。农村女性因受性别、户籍、地域等影响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文化所塑造和限制,进而被建构出一个“乡下打工妹”的边缘化、弱势的群体形象,但作为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个体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制度、他人和社会对自己身份的规定,她们通过被动适应、主动反抗等不断挑战这些既定的身份,积极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但农村女性的主体建构却并不仅在于此,一旦实现身份的跨越,在追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她又无意识地与现有的结构性压迫“合谋”,从而再生产了这种社会结构,体现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复杂性,是“一种相互交织、相互缠绕、此消彼长、纷繁多变的‘非线性状态’”^[42]。

女性能够借助城市中积累的多元化资源,通过发挥个人能动性,将这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进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自我赋权,从而完成个体身份的转型与主体身份的重塑。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是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

本研究仅提供了一位女性农民工务工创业的生命叙事,研究样本较为单一,从其间可以窥见宏观的社会环境变化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动态、全面的影响,但个体可以凭借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捕捉并利用社会变迁中的机遇,挑战并挣脱既有社会结构的束缚,实现自我身份与主体性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虽不可避免地再次嵌入并再生产了某些社会结构,却也凸显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双向互动、相互塑造的深刻逻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融合城乡发展,这无疑为女性农民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相信在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农民工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更是能够自信追求经济独立与自我价值的个体。随着城乡融合的持续深化,千千万万如阿燕般的女性农民工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乘风破浪、贡献力量,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与进步。

参 考 文 献

- [1]孙信茹,赵洁.手机拍照、社会参与及主体建构——基于一个城市中老年女性群体的观察[J].现代传播,2018(2):26-31.
- [2]何芸,向荣.青春与手机:家政女工生命历程中的自我重构与关系再造[J].中国青年研究,2021(7):73-80.
- [3] MAHMUD S, SHAH N M, BECKER S.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 rural Bangladesh [J]. World development, 2012,40(3):610-619.

- [4]董云芳,范明林.女性农民工的生命轨迹与职业流动: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26-38.
- [5]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M].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6]朱炳祥.自我的解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7]苏熠慧.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90后”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型学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21(6):44-57.
- [8]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9]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10] CRENSHAW K W.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J].Stanford law review,1991(43):1241-1299.
- [11]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12]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1981—1982[M].2版.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3]SUSAN H.Reconstituting the subject:feminism,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J].Hypatia,1991,6(2)44-63.
- [14]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M].狄玉明,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5]项飏.流动、传统网络市场化与“非国家空间”[M]//张静.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16]潘泽泉.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解释社会的可能性及其效度——兼论农民工研究范式的转换[J].学习与实践,2009(5):98-108.
- [17]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M].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 [18]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J].社会学研究,2008(3):143-171,245.
- [19]朱虹.打工妹的话语策略与城市适应[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4):133-141,144.
- [20]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J].社会,2008(6):153-175,227.
- [21]肖索未.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22]何明洁.工作:自我转换的平台——服务业青年女性农民工日常工作研究[J].青年研究,2008(2):1-9.
- [23]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工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8(5):58-71.
- [24]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25]卫小将,何芸.主体性的再思与打造:社会工作视阈中的农民工[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00-105.
- [26] GARDNER P,DESSER C,MURPHY C,et al.Women on their own: a powerful force for change[J].social policy,2003,34(2/3):43-48.
- [27]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28]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51-165,223.
- [29]金一虹.中国妇女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赋权的回顾与展望[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4):8-23.
- [30]袁超,张东.流动赋权: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质量[J].经济经纬,2021(1):57-65.
- [31]潘泽泉.被压抑的现代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1):57-63.
- [32]罗海蓉.“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J].读书,2001(3):18-26.
- [33]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159-160.
- [34]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 [35]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36]曾丽红,叶丹盈,李萍.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兼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J].新闻记者,2021(9):86-96.
- [37]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38]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凌复华,彭婧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 [39]赵小华.女性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种新解读[J].妇女研究论丛,2004(4):10-15,60.
- [40]戴雪红.他者与主体:女性主义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07(6):30-35.
- [41] KABEER N.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J].Development and change,1999,30(3):435-464.
- [42]李有亮.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多重身份及修辞策略[J].天府新论,2016(5):139-144.

Mobility Empowerment: A Study on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KONG Hai'e

Abstract Mobility, as a form of empowerment, enables rural women migrating to cities to achieve “disembedding” from their original rural contexts and “disentanglement” from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The mobility process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constitutes an empowerment dynamic where resource accumulation and agency interact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s and the exercise of agency, women achieve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evels, accomplish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They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subject image, with autonomous awareness, capable of freely choosing and realizing self-value. Women transition from being constructed as “women”, “factory girls”, and “country folk” to “independent women”, “bosses”, and “city dwellers”, breaking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and shackles of patriarchy, binary social structures, and class hierarchy while also constructing their own self-ident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s, processuality, and complexity.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undergoes a process from passive adaptation to active resistance, and then to unconscious complicity. Economic independence,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and the awakening of self-awareness emerge as the main path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Key words mobility empowerment; female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soci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金会平)